

红楼梦魅力探秘

周思源
著

411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楼梦魅力探秘

周思源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红楼梦魅力探秘

周思源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华昌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17,000

1994年5月北京第1版 199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7-5039-1290-1/Z·52

定 价, 8.00元

序

近几年来，思源兄在许多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我作为他当年求学时代的同窗，又是《红楼梦》的同好，这些论文常常有幸在发表前就拜读一过。

这次思源兄即将出版他的红学专著《红楼梦魅力探秘》，我读了原稿后，很受启发，写下我所受到的教益，聊以充作本书的序。

《红楼梦》虽然只是一部古典小说，但却是一部十分奇特的小说，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华夏文化的结晶。紧跟着它的问世，文人雅士“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以不知此者为不韵”，出现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风靡状况。于是，论“红”遂成为一门专学——红学。

八九十年代，红学又形成了一次高潮，无论是卷进红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还是出版的红学著作，都为前代所不能相比。故有红学为当代两大显学之一的戏称。

在诸多的红学论著中，有时代背景的考察，有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考索，有版本和成书过程的考辨，有书中涉及名物、制度的考据，当然最大量的是思想、艺术的评论和研究。而且各个方面都有各自的建树。

这两年，这种热门的状况，或者说在论著的数量上，有所减杀，但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又似乎有了新的进展。仅就思想、艺术的研究来说，以往多从文学批评和诠释的角度立论，即研究《红楼梦》写了些什么。这当然不可或缺，而且有不少很

有分量的佳作。但是，从创作的角度，即研究《红楼梦》为什么这样写，却是个少有问津者的课题。思源兄的这部《红楼梦魅力探秘》正好在这个课题上作出了可喜的成绩，所以，读起来便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读后的体会，是否如我所说，读者自会作出各自的判断。

林冠夫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日

迟识红楼，误堕红海

（自序）

我很早就接触《红楼梦》，但很迟才认识《红楼梦》。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事隔三十年才重新发现《红楼梦》，恐怕就是因为接触太早之故。

五十年代初我跨入初中大门不久，便囫圇吞枣地将《红楼梦》扫了一遍。当时使我更感兴趣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是《三侠五义》之类。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第二年，我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被分入文学专业现代文学专门化。其时正批判“厚古薄今”，又忙于拣废铁、盖新楼、割水稻、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因此当小高炉熄火之后，同学们纷纷从当时新落成的堪称全国大学之最佳的图书馆狼吞虎咽地饕餮各种书籍，以找回失去的时光。我也一样，但就是没有再读《红楼梦》。因为我觉得主要情节、人物都还记得。看过了，就以为懂了。

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和另一个年轻人应一位戏剧界的前辈之邀，共同将《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时，我才开始认真重读。读后的第一个收获就是，至少我的才能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又听说当时好几位名家也都在改编，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

但从此便有一个问题一直梦魇般地萦绕于我心中：为什么《红楼梦》这么经得起反复阅读、长期研究？其无与伦比的巨大艺术魅力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将它作为一个红学

问题来研究,而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在思考。我之所以对这个问
题特别感兴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对当
今小说创作,主要是长篇创作起一点推动作用。

长篇小说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
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最重要的文学奖,如瑞典的诺
贝尔文学奖、前苏联的列宁文学奖等,主要评奖体裁也都是长篇小
说。在我国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这十几年里,长篇小说创作也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1977年出版57部,1980年突破百部大关,
1985年又翻了一番,1986年竟多达317部。而1949—1976年间出版
长篇小说最多的1959年才出了32部。据统计,1977—1986年的十
年中共出版长篇小说1413部。^①时至今日,总数恐怕已超过三千。
在这数以千计的作品中,究竟能有多少部称得上是思想上艺术上
均属上乘的呢?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共16部,进入复选的还
有大约40多部,加上其他一些得到读者与批评家公认的佳作,总数
约有100部,约占百分之三左右,应当说已相当可观。它反映了十
几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上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在题材的拓宽,主题
的开掘,内蕴的丰厚,还是在手法的多样,艺术思维的多向,艺术典
型的多彩、生动与深刻,小说语言的提炼与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我认为,这十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无论是总体成
就、单部水平,还是艺术典型的数量与质量,都已超过了三十年代
和五六十年代。

但是当我们从文学研究而非一般阅读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卷帙
浩繁的作品时,总不免有些感叹:我们至今似乎还很难找到几部小
说经得起多次的品味式精读和反复的解剖式研究。有些作品初读

① 据孙武臣《长篇小说发展论》附录,其中有少数为重版书,有的多卷本分几
次出算几部。

时印象不错，亦颇有几处激动人心，但读第二遍时就兴味大减，甚至有的被认为是非常优秀的“史诗性”作品，当评论的高潮退落之后，连有的评论家自己也感到赠之有愧，因为其中并没有很多经得起反复研究和令人经久回味的东西。有的虽然体制宏大，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和众多历史人物，但写得粗糙冗长，令人望而生畏，难以终卷，更不敢重读。有的在当时确为上乘之作，各种赞美与荣誉受之无愧，但时过三年五载，人们忽然发现，原来的那座高峰其实不过是登山旅途中一座较高的山峰而已。当人们在山下时看到它那高耸云天的身影，其实只是它的相对高度较高。而当人们置身高处，便会发现它的绝对高度并不很高。也就是说，有的作品由于当时在题材、主题等方面用他人所未用，言他人所未言，具有某些创造和突破。这些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相对价值。但从作品的结构章法、情节安排、细节运用、典型塑造、语言提炼，乃至主题的深入开掘等方面来看，都还不尽人意。因而作品的总体绝对价值并不很高。当这些题材、主题或写法为人们所习用甚至已超过它时，即人们已登上比这座山更高的山巅，那时它的相对高度就大大降低，甚至已在“一览众山小”之列，主要是具有文学史意义了。这样的相对价值高而绝对价值不高或不很高的现象，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事实上许多文学作品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诵，历久不衰，正因为其绝对价值高。相反，有的作品当初曾轰动于一时，后来却几乎湮没无闻，只为少数研究家所知。也有的作品当时并无很大影响，但由于其绝对价值高，终于为后人发现并得以肯定和广为流传。当今长篇小说所缺乏的就是绝对价值很高的精品。

正像航空发展史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螺旋式改为喷气式突破了音障，促使飞机制造发生了一场革命一样，当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也面临着突破自己的“音障”。如果认识并跨越了这一障碍，那么长篇小说创作乃至整个文学创作都将跃上一个高高的

新台阶，小说精品，真正经得起时光磨洗的史诗性杰作，就会源源出现。

这个“音障”就是大大提高文学作品的浓度。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论红楼梦的浓度》^①的论文。其时正值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映，我边读小说边看电视，又想到了一些问题，写了几篇文章。一九九〇年春夏之交，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新摄制的六部八集艺术巨片《红楼梦》全部公映前，邀请部分首都评论家、红学家及报刊记者约三十人，举行了三天的看片、座谈。我的老同学、红学家丁维忠（丁淦）是影片顾问之一，经他介绍，我也应邀与会。第三天下午我发言时，北影老厂长汪洋大概看出大家都不认识我，而我是丁维忠介绍来的，便在我自报家门时大声说了一句：“红学家！”那时我总共才发表了三篇红学论文，仅两万五千字，连红学会会员都不是，所以我慌忙声明：“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红学家。在红学上，我只能算是夹了个‘塞’的‘夹’。”但是过了几天，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在头版发了一条消息，报导了这次活动，在与会的“首都红学家”中将我的名字列入。我看了啼笑皆非。因为我不仅确实不是红学家，而且到那时为止我从未想过要成为红学家。当时我的研究重点也不在此。我有三位中学或大学老同学都是货真价实的红学家，我还曾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干吗非去挤那座独木桥？”这下好了，我也被挤到了桥头，而且没有了退路。让报纸一登就更麻烦了，想不当都不行了，别说对不起汪洋和记者的错爱，还有可能被人误以为是招摇撞骗呢。这红学文章我是非往下写不可了。

我就这样，迟识红楼，误堕红海。既已落水，便身不由己，唯有奋力朝彼岸游去而已。但由于种种原因，到一九九三年底，我发表

^① 《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

的红学论文也仅十一篇，十万字而已，中心就是想探究一下《红楼梦》的艺术魅力之谜。后来，就以这十一块砖为基础，盖了这间聊以栖身的小屋。同时也为有志于从创作论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道友、同好，提供一个歇脚、喝水的地方。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借此机会对在我治红路上鼓勉、支持和督促过我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深切的谢意。没有这些热情的手就不会有今天这些成果。我的多数论文下笔前都征求过老同学、红学家丁维忠或林冠夫的意见，他们认为有新意我才撰写。去年应冠夫之约写了一本《〈红楼梦〉与清代文字狱》，这才鼓起余勇，趁热打铁，写作此书。这次他又拨冗为我作序。我的红学论文多数发表于《红楼梦学刊》，若无编辑们多年的扶持，很难设想我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尤其要感谢冯其庸先生。虽然四十年前我在江苏省无锡市一中求学时，就听二中的文友们谈起过他们这位语文老师的学问和调京教大学之事，我自己来京也已三十多个春秋，但至今尚无缘拜谒先生。冯先生百忙中为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后学题写书名，使我深为感动。我还要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同志们，是他们不辞辛劳和高效率的工作，才使拙作得以迅速问世。

周思源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

于北京语言学院三间屋

目 录

序.....	林冠夫 (1)
迟识红楼, 误堕红海 (自序)	(1)
绪论 说不尽的《红楼梦》	(1)
第一章 无尽魅力来自于高浓度	(11)
第二章 庞大主题群与独特的价值取向	(32)
第三章 多种结构元素与新奇别致的以情串文 结构方式	(56)
第四章 被彻底颠覆的世俗观念	(74)
第五章 具有超前意识的反“天理”性观念	(94)
第六章 悲剧艺术从此跃上高峰	(121)
第七章 融不同创作方法为一体的奇特效应	(142)
第八章 诗词曲赋大大拓宽了信息渠道与 审美领域	(159)
第九章 具有多向审美可能的艺术典型	(183)
第十章 出色解决了篇幅有限、人物众多、 典型生动的矛盾	(203)
第十一章 三等人物也经得起一等分析	(225)
第十二章 高度发达的人物话语	(251)
结束语 开发《红楼梦》的艺术生产力	(278)

绪 论

说不尽的《红楼梦》

《红楼梦》^①的艺术魅力实在太巨大了。过目者无不怦然心动，感情激荡。因此在《石头记》诞生之初——说得更准确些是还在创作过程中，就已经赢得最初的几位读者的高度评价。甲戌本脂批赞其“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为千古未闻之奇文”。（一回）曹雪芹去世不久，带脂批的抄本便渐渐传开，人们争相传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径而走矣。”（程伟元：程甲本《红楼梦》卷首）程伟元、高鹗在乾隆五十七（1792）为程乙本所作的《引言》中写道：“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传乾隆时期的《石头记》抄本，尚多达十一种，即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

《红楼梦稿》本、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南京图书馆藏本、梦觉主人序本、舒元炜本、郑振铎藏本、前列宁格勒藏本等。加上近人见过今已遗失的南京靖应鹏藏本和程甲本前八十回的底本，共有十三种之多。一些民国初年铅印上千的书如今已仅存孤本或踪迹难觅。而《石头记》抄本历二百年竟尚传或知十三种，便可见当年抄本之众，流传之广了。待程甲本和程乙本以木活字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与翌年先后刊印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乾隆

① 本书所说之《红楼梦》除特别标注者外，均指曹雪芹创作之《石头记》前八十回，版本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时人裕瑞在其《枣窗闲笔》写道，一时“纸贵京都，雅俗共赏”。

（转引自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西清《桦叶述闻》云：“《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红楼梦卷·邓之诚〈骨董琐记〉》）由于刊刻后售价大大降低，各地书坊竞相翻刻，因而这部艺术巨著迅速进入清贫文人和寻常百姓家。“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红楼梦卷·梦痴学人〈梦痴说梦〉》）尤其是文人学士之家，此书几为必备之物。到后来见面不谈红楼，便似乎有失高雅博学了。“故《京师竹枝词》有云：‘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

（同前）憧憬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和美满，试图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这是许多作品早已反复表现过的主题。但是《红楼梦》将爱情写得如此高尚、真挚、执著、纯洁、热烈，因而特别能深深地打动被封建礼教的绳索紧紧捆绑着的青年男女的心。尤其是受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压迫最甚，在爱情上最没有自由的女性，更为贾宝玉的一片痴情所激动。刊于道光元年的乐钧《耳食录》记载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有一个姑娘“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食读之。读至佳处，往往辍卷冥想，继之以泪。复自前读之，反复数十百遍。卒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语无伦次，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延巫医杂治，百弗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饮泣而瞑”。（《红楼梦卷》）“乾嘉时期对《红楼梦》留下诗词的颇多女性，特别是青年寡妇。”（同上书《编辑说明》）显然是与《红楼梦》的颂女、悼红主旨及其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分不开的。刊于嘉庆年间的陈庸《樗散轩丛谈》，记述常州有一个书生“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冥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寝食并废，匝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同上书）因而清人杨懋建在《梦华琐簿》

中奉《红楼梦》为“天地间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杨恩涛《词余丛话》说它是“小说中无上上品”。（均同上书）光绪年间人汪大可甚至说：“《红楼梦》以前无情书，《红楼梦》以后无情书……，《红楼梦》之前未有作者，《红楼》之后无敢作者，非无作者，作者不能脱《红楼》窠臼耳。”（《红楼梦卷·泪珠缘书后》）《红楼梦》在情感上如此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弦，自然不能为封建卫道士们所容。梁恭辰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红楼梦卷·北东园笔录》）因而各地官府明令禁毁各种“淫词艳赋”时，《红楼梦》总是名列前排。但时代毕竟在前进，当时的清廷已没有力量像康、雍、乾三朝那样用大兴文字狱的办法禁书了。禁书的结果往往促进了被禁书的流行，对好书来说尤其如此。当时禁《红楼梦》毫无效果，从下述事中可见一斑：同治年间人黄钧宰记述他于某年腊月路过南京，借寓某寺十八日，夜间常与和尚为山煮茗清谈。为山书房有一套精致的《红楼梦》。黄钧宰感慨道：“余意其必将掩藏，而举止殊无愧色。雪芹作此，原与天下能作和尚者读，不与凡夫俗子读也。能读《红楼》乃是真和尚，读《红楼》而见人能不掩藏，乃是绝好和尚。”（《红楼梦卷·金壶浪墨》）不仅是方外之人公开读《红楼》，就是奉令严行查禁的总督衙门，也有人悄悄将《红楼梦》夹在堆满大半桌子的《御批通鉴》之中，引得别人大笑道：“督署亦有私盐耶？”（《红楼梦卷·能静居日记》）因此除极少数道学先生外，人们均置禁令于不顾，从而使那些封建卫道者们痛心疾首。嘉庆朝曾历任礼、吏、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的玉麟，在嘉庆十二年（1807）任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红楼梦卷·北东园笔录》）

纵观清代乾嘉以降凡一百五十年，除清末有个别人主要从索隐的角度说“《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红楼梦卷·清

稗类钞·著述类》)和个别人主要是王国维从美学意义上认识外,不论是赞美还是诋毁,绝大部分人都是从情感层面着眼的,而忽略了其他层面的丰富内涵。不过清代已有人注意到《红楼梦》内容博大精深,有许多含义隐藏于语言文字之外,非一时便能深刻理解其“指归”。但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真正认识《红楼梦》的伟大价值。紫琅山人道:“作者洋洋洒洒千万言,一往天下后世之知者愚者,口之耳之目之,而其隐寓于语言文字之中,以待默会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又逆料天下后世必有人焉,能得其指归之所在。笑我罪我,皆所弗计,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譬诸黄钟宝鼎,与土鼓瓦缶颠倒是富而贫、贵而贱之家,玩弄于妇孺之手,或数世或十百世,而终有识者出也。”(《红楼梦卷·妙复轩评石头记序》)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对《红楼梦》之“识”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情有独钟,在五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亲自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评红”活动,后来其内容与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红楼梦》的范围。这两次“评红”的政治目的、历史作用究竟如何,暂且不论,但在空前普及《红楼梦》上是毋庸置疑的,对《红楼梦》研究和以往相比,有些方面——主要是从社会层面之“识”大大深入了,而其他方面有的很少触及,有的甚至倒退了。

真正大规模地从美学(艺术、创作、文化、哲学、语言等)层面去“识”《红楼梦》,并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接近“得其指归之所在”,是在一九七七年以后,红学研究开始了一个最新也是最大的高潮,学术意义上的《红楼梦》研究这才正式大规模开始进行。这个新时期的主要标志是:

出版了以庚辰本为底本,以其他各种脂评抄本为主要参校本,以程本及其他早期刻本为参考本,从而集各版本之长的新版《红楼梦》。此书校勘精细,注释详备,对普及《红楼梦》和推动红学

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

成立了由文化部领导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一部小说成立一个国家级研究所,在中国固然是首次,在世界上也闻所未闻。该所成立之初,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人,都对是否有必要单为一部书成立一个研究所表示怀疑。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通过红学所这个核心,以红楼梦学刊编委会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会等为外围,将全国的红学家和红学研究者、爱好者团结了起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新版《红楼梦》和至今已出版五十多辑发表论文上千篇的《红楼梦学刊》及《红楼梦大辞典》等大工程,都是该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是红学家集中的地方,他们编辑的《红楼梦研究集刊》在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也出版了十多辑。许多其他报刊,尤其是一些大学学报,也都发表了许多红学论文。全国性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举行了7次,国际性红学研讨会举行了2次。红学真正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成了汉学的重要一支。

这些丰硕成果,自然都是红学队伍迅速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的结果。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虽仅数百人,一些省市红学会会员人数也不太多,但实际上许多语言文学工作者,特别是大学中文系教师,都兼作红学研究。有的,如著名作家王蒙,论文连篇,颇多独到之见,还出了专著。笔者所在的北京语言学院来华留学生二系(现代汉语专业),有教师110人,其中中文系出身的约90人,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过红学论文或有专著的就有7人。

最主要的是,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妨碍红学研究的绳索一一被挣脱,条条框框迅速被打破。人们不仅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红学史,充分吸收二百多年来红学研究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且能以新的思维方式、观念、范畴、语言来重识《红楼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统计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新的艺术批评方法被引入红学,使人们发现了《红楼

梦》中的许多新天地。在我看来，这十几年来红学研究的成就超过了前二百年的总和，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曹雪芹，更了解《红楼梦》。其中最大的发现就是，我们终于认识到，《红楼梦》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宝藏有待我们去发现！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中国小说像《红楼梦》一样进行了如此广泛、深入的研究。因为大部分小说都经不起深入研究，有一些甚至不值得研究，只能作为某种文学现象被提及或被“等等”进去。只有极少数优秀小说成为传世之作，其中的佼佼者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才经得起反复深入的研究。但没有任何优秀作品像《红楼梦》这样经得起如此长期的反复的精细的解剖式研究，引起这么多争论，至今还有这么多歧见。古代的不去说它，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红学界影响较大的争论，据刘梦溪《红学》^①统计，就多达十七次。第一次是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批评索隐派代表人物之一、《石头记索隐》的作者蔡元培以及蔡的反驳。一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将、北大名教授，一位是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任北大校长，因而此争格外引人注目。第十七次是指1986年两位海外著名学者唐德刚和夏志清关于《红楼梦》乃至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评价高低之争。其他十五次既包括《红楼梦》著作权、地点、曹雪芹卒年以及关于《废艺斋画稿》、“佚诗”与曹雪芹画像的真伪之争，也包括1954年开始毛泽东亲自过问引起的那场大讨论。这类争论近几年并没有停息，而是讨论得更为深入。我故意用“讨论”而不用“争论”，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也许还包括部分下一代人，已经被以往超学术的争论弄得精疲力竭。那种在非正常环境中高度发育的二元对立思维，那种将“争”变成“斗”，“斗”就要“你死我

^①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版。